

RIBEN JINGJI
YU CAIZHENGZHENGCE

星川顺一●著

朱东平●译

日本经济 与财政政策

——凯恩斯政策的忠告——

立信会计出版社

星川顺一●著

朱东平●译

日本经济 与财政政策

——凯恩斯政策的忠告——

立信会计出版社

日本经济と財政政策

——ケインズ政策のすすめ

著者 星川順一

発行所 株式会社 晃洋書房

日本经济与财政政策

——凯恩斯政策的忠告——

星川順一 著

朱东平 译

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429-0470-1/F·0439

定价:14.5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星川顺一先生是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也是译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作者长期从事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这一点可以从本书的内容中得到充分反映。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美日间的贸易不平衡,分析是否应该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解决日本经济中庞大的贸易黑字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坦率地说,虽然从事研究的专业领域不同(本人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但译者也始终非常关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动向。尽管如此,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还是时常因捉摸不透真实含义而不得不直接向作者请教。给我的翻译带来困难的,主要是我所习惯的数学符号在作者那里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经济现实。也就是说,作者积多年的理论研究功底,在严密的数学模型下,使用语言对现实进行了解剖。作者在前言中说,希望本书能够成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应该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作者实现了他的意图。

本书的第二个特征是,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自己国家所抱有的忧患意识。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现实。因此,即使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也必须时时关心自己身处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在理论上的生命力。但像本书那样既保持了理论的严谨,又在字里行间体现对本民族忧患意识的研究风格却并不多见。虽情感激烈,但却始终不逸出理论的轨道。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毕竟,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只停留

在象牙塔中的学问。其严密的逻辑最终必须服务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对此,译者自己也不得不进行深深的反思。

基于本书的以上特点。在立信会计出版社和日本晃洋书房的大力帮助和协助下,将它介绍给各位读者。由于作者紧扣着隐藏在背后的理论模型展开分析,其一字一句常常都是数学符号的语言化,因此,尽管译者尽了最大努力,并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适当作了语言上的调整,但仍存在着某些难懂之处。不过,由于本书整体上的线条较为清晰,因此,即使越过难懂之处也仍然可以把握其总体思路。此外,作者所处社会制度的不同,影响了作者的思考方式。对这些,希望读者能够予以冷静的判断。

最后,对因译者在语言和理论上的局限所带来的错误,也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朱东平

1996年8月于大阪

致中文版的序

对我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出版深感荣幸。本书虽名为《日本经济与财政政策》，但其内容却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财政和经常收支赤字，通过对其原因的分析，提出日本政府所应采用的政策方案。

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又包括收入和支出这两个方面，而后者则又可以被区分为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转移支出和公共投资。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发行国债而进行的减税，在储蓄率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增加不完全雇用情况下的GNP。但是，根据李嘉图的中立命题（新古典主义），在“代表性个人”这一假定下，国债的发行会同时使人们意识到由将来国债的还本付息所引起的增税。这样，由国债的发行所带来的减税会完全被用于个人储蓄。因此，国民经济中的储蓄总额将保持不变。

1985年的广场协议（译者注：指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 Hotel）举行的五国财长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引导美元贬值的协议）以后，里根于1986年进行的税收制度改革，导致了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下降。而国内储蓄的不足又必然地引起了经常收支的赤字。这一事实使新古典主义命题偏离了现实的经济生活。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并不说明理论的错误，它只是告诉我们，“代表性个人”这一条件在美国经济中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美国的通货当局，为了减少对外债务而采取了引导美元贬值的政策。1985年的250日元/美元在三年后的1988年居然下降为125日元/美元。这在以美元发行债券的国际债券市场上，使日本

蒙受了巨额的汇率损失。

针对这样的事态,日本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高速增长长期中形成的家庭储蓄率在其后也仍然居高不下,但企业投资却在高速增长结束以后大幅度地下降。根据我的假说,应该在民间部门过剩储蓄的前提下,通过发行国债而为下一代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消除经常收支的黑字。因为公共投资能够扩大国内需求,从而使经常收支走向均衡。

但是日本的大藏省和中央银行却放弃了财政政策(特别是公共投资),只是一味地依赖于金融政策。1985~1990年间的现金通货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两位数。在日美间存在利息差距的情况下,这促进了日本资本向美国的流动。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汇率损失的同时,国内流动性的过剩又促进了对非贸易品(土地)的投机。所谓的不良债权便是这样产生的。

本书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在民间部门存在过剩储蓄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公共投资。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eckscher-Ohlin)命题,没有物质资源的日本经济只能依靠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才能得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下一代的教育和科研投资极为重要。

当然,日本也可以以日元债券的形式使日本民间部门的过剩储蓄服务于海外各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问题上,尽管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利息率平价假说认为,资本流动与债券发行中所使用的通货种类无关,但人们却不能不对主要通货国的政策判断和行为表示担忧。因此,为了使事态能够平稳地发展,还是以债权国通货发行债券更令人放心。

在最近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对美出超额已经超过了日本。从这一意义上说,尽管本书以日本经济为对象,但对中国经济来说,或许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章所分析的社会保障问题,是现代社会共通的重要课题。

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能够对中国经济具有某种参考价值,笔者将感到十分高兴。社会保障问题也应该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

第四章提出了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假说。收入差距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这一问题极为重要。而在这一问题上,税收制度同时也可以成为调整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章中,累进性课税(直接税)和对生涯收入的同率课税(间接税)之间的组合问题将成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对本书进行翻译的朱东平先生,曾作为公费留学生在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专攻现代经济学理论。他是企业理论研究中的后起之秀。在此,对他的翻译表示衷心的感谢。

星川顺一

1996年8月

前 言

经济分析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理论家们热衷于模型分析,而另一方面则又存在着与理论分析全然不同的现状分析。由于理论模型多使用难解的数学,因而常常会使人望而却步。也许正是这一点助长了无视理论的实证分析的泛滥。然而,似乎难解的理论模型,就对经济现象进行解剖而言,却是一种极为先进的分析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极为具体的分析手段。尽管出于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一目的,模型分析常常使理论显得颇为难解,但这并不等于说理论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研究。致力于解剖具体现实的理论家们的才智和努力必须得到高度评价。

本书试图以理论模型为基础,说明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政策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试图成为理论模型与现状分析之间的某种桥梁,试图对数学模型如何适用于日本经济的具体问题,以及如何使用理论来解决日本经济的政策课题等问题有所启迪。就像化学实验离不开物理理论一样,没有理论的帮助是不可能进行经济分析的。

在国际交往正日趋紧密的现代社会中,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关系之外。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间的交往是日本经济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国际间交往在使日本经济得以繁荣的同时,也为日本经济带来了种种困难。今天的日本经济所面临的课题,迫切要求我们在充分考虑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制定国内政策,而决不能只是单纯地从国内因素出发。

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财政赤字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

经济。本书将首先指出,由谁来负担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一博弈正成为今天的日本经济面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李嘉图的中立命题将成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李嘉图中立命题指出,政府储蓄与家庭储蓄之间存在着完全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导致财政赤字(国债发行)的政府支出不能为下一代留下遗产,那么这样的财政赤字便必然会成为将来的负债。这样,对国债在将来必须还本付息的预期便会促使家庭提高储蓄率。但是,很难认为这一命题也适用于当今的美国现实。如果这一命题不能成立,那么就必然会发生不同世代间的收入转移,从而使现在世代的“奢侈”建立在下一世代的贫穷基础上。但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李嘉图中立命题的成立呢?

有人认为,政府在时间上拥有比个人更长的视野。但对此,(Barro,1974)根据“父母都关心孩子”这一随处可见的事实,使用理论模型进行了反驳。在理论上,只要所假定的个人或者家庭是理性的、具有代表性,那么中立命题便必然成立。这是因为,对于代表性个人来说,今天的财政赤字所带来的恩惠(减税或者年金的增加)意味着明天的负担(增税)。因此,代表性个人的这一假定意味着,财政支出能否实现均衡的问题,实际上取决于由社会成员所构成的共同体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嘉图中立命题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财政机制能否使人们认识到今天的收益将会成为明天的负担。

(Weil,1989)指出,次子不拥有遗产继承权的长子继承制度会影响李嘉图中立命题的成立。其理由如下:在多世代交叠模型中,因赤字国债所带来的减税尽管可以促使第一世代增加储蓄,但由于下一代中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对国债的本息进行偿还)的“次子”不能继承遗产,因此,第一世代所必须增加的储蓄(遗产)额便可以不必完全与财政赤字的受惠额相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的储蓄增量将小于政府储蓄的减少额。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这将导致国际收支的赤字(国内储蓄不足)。

因此,当代表性个人这一假定不能成立时,李嘉图的中立命题也便不再成立。在人们产生“财政赤字的受益者(年金的增加,减税等)是自己,而负担者则是他人”这样的预期时,财政赤字是不可能提高家庭储蓄率的。这样,整个经济的储蓄率会趋于下降。经常收支也会发生赤字。而当经常收支赤字国的通货膨胀导致其通货贬值时,以债务国通货筹措的债权便会使黑字国蒙受重大的汇率损失。这样,储蓄供给国(日本)的国民实际上便成了不拥有参政权的纳税者。在一次性博弈中,以上机制对赤字国来说是极富魅力的。

但是,曾经蒙受损失的人试图避免第二次损失是极为自然的事。其实,如果资本收支的赤字能够足以与经常收支的黑字相匹敌,那么汇率便不会发生波动。因为经常收支的黑字本身并不能左右汇率。从根本上说,汇率取决于与经常收支相对应的资本收支的动向。事实上,与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有关的外汇交易只是整个外汇交易中的一小部分。外汇交易中占压倒多数的是与资本交易有关的外汇买卖。在资本交易中曾经蒙受汇率损失的一方必然会力图避免第二次损失。从日美关系上看,今天的日元升值,与其说是由于日本经常收支的黑字,还不如说是由于没有能够发生足够的对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元需求)。正是由于人们不愿第二次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不享有参政权的负担者,才导致了汇率的过敏和美元的贬值。而且,在核心通货为债务国通货的国际市场上,债务国政府也并没有阻止本国通货贬值的动机。

尽管以上问题发生于不同的国民经济之间,但对其本质,我们却应该从不同经济中的财政运行这一角度进行把握,而不应只是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上。

在以广场协议为契机的日元急剧升值过程中,利息率平价假说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强有力挑战。对美国进行投资会蒙受汇率损失,而如果不进行投资则又会招来因日元升值而发生的经济萧条。

今天的日本经济正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其财政运行进行一定的节制,那么,为使日本经济摆脱以上困境的根本途径便只能是转变国内政策。

从根本上说,日本政府应该采用以下三项政策。

第一,改变贷款者以借款者通货进行投资的市场条件。由贷款者承担经常收支赤字国的通货贬值风险这一现行市场条件,在日元的急剧升值使人们难以对两国间利息差额抱有期待的情况下,会使经常收支黑字国的对外投资过于谨慎。而与和缓的汇率调整相比,日元的急剧上升对出口产业所带来的打击将更为沉重。

为了使以债权国通货发行债券成为现实,债权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成为世界上最自由也是最富魅力的市场。日本政府应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各种行政限制的缓和,首先应该从证券市场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自己的储蓄流失于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变动。

以债权国通货发行债券,同时还能促使债务国为维护其通货价值(缩小财政赤字)而作出努力。在现行的市场条件下,债务国政府对本国通货的贬值没有必要作出任何反应。但这样的事态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1995年6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称,西方七国将在外汇市场上“坚持紧密的合作”。尽管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国际协调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但以债务国通货进行债权和债务契约的现行条件,事实上很难使债务国真正拥有维持其通货价值的动机。

第二,尽管也许会带来一定的效率问题,但仍然应该设法使日本的过剩储蓄转向国内投资。笔者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中曾经强调,而且现在也仍然坚持以下观点:在投资率基本适应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所发生的过剩储蓄,不应使用经常收支黑字,而是应该使用公共投资的方式加以吸收。日本列岛所处的严峻自然条件已经从阪神大地震中得到了反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公共投资

应该具有广阔的投资领域。

同时,对缺乏物质资源的日本来说,对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是它在国际分工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在这一意义上,还应该对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充实为核心的公共投资作出果断的决策。拥有国内储蓄剩余,并将这一剩余予以出借的国家,反而遭到储蓄接受国的责难。这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微观层次上,只要不是高利贷,通常借款者是不会责难贷款者的。之所以在宏观层次上会发生以上现象,除了政治上的理由以外,还由于有效需求上的原因。但事实上,即使在对方具有足够有效需求的状态下,也仍然遭到责难。这种借款者责难贷款者的莫名其妙的游戏应该早日结束了。

同时,尽管可以要求债务国政府进行有节制的财政运行,但政策的最终决定权毕竟是在对方国家政府的手中。在这一制约下,日本经济应该在适合自己资源禀赋的条件下,探讨在国内对储蓄剩余进行吸收的有效方法。其实,这也是进行国际协调的一种方式。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经济主体会基于他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而理性地行动。它们认为,只重视数量的财政政策往往很难真正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改善劳动素质的问题上)。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没有能够解决滞胀问题,而且在英国等国中政府规模的膨胀又严重削弱了市场的机能。这一切,都可以成为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基础。

但是,今天的日本经济,正在需求的制约下面临着民间部门储蓄过剩的困难。在这一意义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政策,应该在日本经济中得到重新评价。在不能为下一代形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政府转移支出(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支出)上,确实必须尊重李嘉图的中立命题。也就是说,在进行转移支出时,必须对政府规模扩大所可能带来的市场机制的萎缩和政府效率的下降引起高

度注意。但是,只要民间部门存在着储蓄剩余,就应该努力使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干预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为后代留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本书试图在吸取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证为解决今天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而采用积极干预政策的必要性。正由于此,本书将副标题定为“凯恩斯政策的忠告”。

第三,尽管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通常体现在汇率的动向上,但为了使国内市场也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经济在国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缓和对市场的各种行政限制。这样做,将有利于包括风险企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

严格地说,只有当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所获得的资金被用于不可能形成遗产的转移支出(减税或者增加年金)时,赤字国债才成为李嘉图中立命题的考察对象。而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却能够成为对下一代的遗产。因此,只要这些遗产有利于下一代,那么,政府就应该取代家庭,不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而是以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形式形成遗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来世代对国债的偿还不会成为对现在世代的收入转移。将来世代对国债本利的偿还,将成为它们对公共遗产所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代价。因此,与其从事导致汇率损失的对外投资,还不如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国内公共投资更加有利。当然,在进行国内公共投资时,必须坚持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效用都必须相等的投资分配原则。为此,在进行公共投资时,还必须改善各项制度,以使公共投资能够满足以上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公共投资的增加确实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但通货膨胀也会抑制日元的急剧升值,从而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调整。尽管通货膨胀也许会对国内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它却可以防止国民经济间的收入转移。因此,有必要对汇率的急剧变动所带来的破产和失业等调整费用以及对外资本损失,和通货膨胀在国内所带来

的社会费用进行比较。只要前者大于后者,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通过发行国债而扩大公共支出。由高水平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名目领域中造成种种混乱,但在国内储蓄过剩情况下由公共支出这一实际需求的上升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却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与生产扩大相适应的相对价格的调整。

以下,简单地介绍一下各章的概要。

第一章简要地分析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的经过,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储蓄与投资均衡的变化。在这一章中,先进国家赶超过程的结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率下降将成为讨论的核心。

第二章围绕李嘉图的中立命题,讨论政府经常收支中与遗产形成无关的转移支出增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及其后果。它指出,使中立命题不能得以成立的原因(社会成员丧失了同质性)同时也成为阻碍国际经常收支均衡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根据遗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讨论成为李嘉图中立命题考察对象的各项转移支出。它分析了在政府经常收支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并在充分重视银行存款和保险等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分析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制约。它指出,没有必要拘泥于基金方式和统筹方式的争论,重要的是,必须使用实际经济增长率对保险费进行评价,从而建立能够有利于提高劳动积极性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年金制度。

第四章在税收方面探讨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性质及其组合,并分析累进所得税的根据及其制约。同时,它也将分析消费税率的固定性和为了确保水平公平而使用传票方式对收入进行捕捉的必要性。正如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所假想的那样,财政是一种互助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宗教法人进行免税的制度很难被认为能够符合神或者佛所说的“慈悲救人”的信条。在这样的制度下,向人们宣

扬慈悲救人的宗教法人成了苦难众生所建立的互助机制的 free rider(搭便车者)。这无论如何也是讲不过去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信仰的自由混同于社会成员间的互助机制。在宗教法人看来,信仰的自由等于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由,而后者(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由)则又意味着可以不公开会计信息并免除纳税义务。因此,信仰的自由可以使之成为苦难众生间进行互助的 free rider。

第五章分析经常收支的不均衡在需求面和供给面的不同表现。它指出,由于对外资产中所存在的汇率风险,经常收支的黑字国常常会受到损失。因此,从提高国民福利的角度上说,与其蒙受汇率损失,还不如将剩余储蓄有效地用于国内更加有利。

第六章强调,公共投资应该成为吸收民间过剩储蓄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公共投资又必须满足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必需的必要条件(边际效用的均等化)。同时,第六章还将分析为什么可以在现在的日本经济中,通过发行国债而进行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此外,这一章也将考察缺乏资源的经济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的必要性。

第七章将分析使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泡沫现象的起因。为此,它将考察微观投资主体中出现的群体行为现象,以及金融当局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所作出的政策选择。它指出,日本的金融政策受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和日本的财政黑字这一国际财政关系的影响。

第七章指出,将进口品价格作为名目进口额的平减指数来测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做法,干扰了正确的政策判断。如果以国内价格衡量进口额,那么日元的升值可以降低在计算 GNP 时应予以扣除的实际进口额。但是,如果以进口品价格衡量进口额,那么交易条件的改善便不能在 GNP 中得到反映。这样,日元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便会得到夸大。如果以此为依据而实行扩张性的金融政策,那么,便自然会导致经济的过热,从而加速泡沫经济的形成。

由于日本政府固执于财政的均衡主义，因此，针对广场协议以后的日元升值，它试图主要使用金融政策予以对抗。其实，针对1988~1990年间的日元升值，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应该互换才是。在民间部门存在过剩储蓄时，对市场机制的重视不应成为妨碍使用财政政策的理由。

考虑到对微观结构的考察也许会有助于对宏观政策运行的把握，因此在本书的最后加上了第八章。它通过回顾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日本企业改革的改革方向。它指出，由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重视组织效率的日本企业已不得不开始更加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时，对家庭和企业等微观基础的分析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微观主体(民间主体)的行为会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由于第二至第四章已经对家庭这一主体进行了分析，因此，作为对它的补充而加入了第八章。特别是第四章所考察的对劳动的课税效果(收入效果与替代效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设计的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因此，有必要对位于企业理论最前沿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尽管本书对金融政策与企业理论也进行了以上探讨，但其重点主要在财政政策。因此，本书被命名为“日本经济与财政政策”。

从总体上说，本书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两大部分。以第二至第四章所构成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作为李嘉图中立命题对象的不形成遗产的政府转移支出和税收负担。而以第五至第七章所构成的第二部分则分析不能成为李嘉图中立命题对象的能够形成遗产的财政运行。本书的主要论点均在以上这两大部分内。

本书的形成得益于许多先生的研究和帮助。特别是瀬岡吉彦教授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在此深表感谢。尽管由于经济理论的深奥而无法完全消化这些意见，但通过与瀬岡教授的讨论使本书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从出席瀬岡教授主办的周五研究会的各位先生处也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